

後記

有國外的專家學者政客宣佈：「我們正處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黃昏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黎明，這個時代可能還將維持二、三十年，未來的能源體系覆蓋的是生物圈。」
「決戰新能源是一場影響國家興衰的工業革命」，「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徹底改變世界和人類」。

大風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，收錄的正是鄧英淘自 2005 年以來，在這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黃昏、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黎明之時，對中國能源問題的思考。鄧英淘走遍中國大江南北，捕捉一切新能源技術，實地調研新能源的開發與使用，探索中國永續發展的道路。還記得 2005 年當我拿著《石油的終結》，大談德國、丹麥的新能源實踐時，他兩眼放光地告訴我，他剛從山東考察回來，那裡的新能源體系，讓他激動不已，他說，「山東已經顯示出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個主要特徵，內需主導的發展模式、集成推動的城市化進程和重組整合的新能源體系，山東今後的發展未可限量。而且這應該推廣，可以成為中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基調」。那情景歷歷在目。

作為一個編輯，最大的享受是先睹為快，作者的思想、要敘述的話題，總比讀者早一步知曉。鄧英淘對於能源也可以作為城市化發展中的產業、公用事業企業化的許

多想法深得我的認同。我當時湧動著一種情思，面對當今細剖分割的學術技術化，這就是一種跨界的宏大思考的追蹤吧。他指出，「面對 21 世紀已經來臨的環境危機的挑戰和科技進步趨勢的躍遷（如綠色生產和循環經濟），我們需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和創造力」。

然而，我們最缺的恰是想像力和創造力。雖然新能源在中國炒得挺熱，相關政策也不斷給予相關企業大量補貼和支持，以至於海外媒體拿中國作為榜樣，欣賞地稱讚中國的風能、太陽能產業發展已經相當迅猛和先進。但我們知道，實際的應用，卻乏善可陳。那些屹立於黃土高原之上的若干萬臺的風車，無法融入中國電網，似乎成了舞臺的道具；若干產能的太陽能企業，竟被指為「產能過剩」的代名詞，無法得到充分的使用，讓千家萬戶吸納。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在增長方式的轉變中依然十分微弱。在這裡，技術和市場相對於政策和政府，總顯得不相稱。

新能源是一場工業革命，革命就是利益的重新劃分。在此我想舉德國的例子。1990 年，德國通過了鼓勵不含碳能源生產的若干項法律的第一項。該法律叫作《饋電法》（Electricity Feed-in Law），它要求公用事業公司從再生能源的生產者手裡買電，不論該生產者的規模有多小，概不能歧視。《饋電法》實施之後，小規模的投資者開始在德國多風的北部建設小型的風力發電體系。有趣的是，當時德國傳統的能源動力廠商對新能源不屑一顧，所以就沒有反對這項立法。但是隨著風力農場開始在德國的大地上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之後，反對的聲浪隨之出現。尤其是德國北方的電力公用事業公司的反對聲音更是強烈，因為他們必須承擔連接所有這些散處各地的生產者入網的費用。1997 年，公用事業公司和政治保守派修改了饋電法，以限制新能源在市場上的比例不得超過 5%。由此，

這個新生的再生能源產業也就此退潮。1999年，德國的能源政治再次發生了變化。以環境為宗旨的綠黨在議會中贏得了足夠的席位，與社會民主黨組成了聯合政府。2000年，所謂的紅色／綠色聯合政府頒佈了《再生能源法》（Renewable Energy Law），廢止了5%的限制，提出為再生能源生產者提供慷慨的補貼，其資金的來源是所有能源銷售的一筆小額徵稅。公用事業公司反駁說政府的補貼違背了歐盟的自由貿易規則，對這項《再生能源法》提出了質疑。德國政府予以了反擊，說這項補貼只不過是對那些長期未付賬的燃煤及其他的污染能源「內部化」。這項法律站住了腳。此後，德國的風力、太陽能等新能源就迅猛發展起來了。^①

政治勢力的角逐，利益集團的反抗，根本就是「革命」中的常態。

這一點鄧英淘的考察調研得很清楚了，分佈式和強大的輸電網之間的博弈，就是新能源能否扎根的圖景。人類的進步最終會找到一條適宜生存的路，不過，其間鬥爭總是艱苦卓絕的。

鄧英淘是戰鬥中的一員，他對所有可能的新能源技術都求知若渴地去領悟，他讚揚一切新事物，無論你是無錫的太陽能，還是山東的陶瓷太陽能板，可以把它放到戈壁灘創造財富，讓南疆貧困的人邁入富裕的路；無論是山東的秸稈發電，還是在南水北調中使用風能；無論是海水淡化還是生物質能轉化，對他來說，那都是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」的新能源！綜合考慮，根本的是為了在這場進步中奪得制高點。

^① 保羅·羅伯茨著，吳文忠譯：《石油的終結：頻臨危險的新世界》，中信出版社2005年。

鄧英淘的思想邏輯，正是我想要強調的：什麼樣的制度，可以激勵創新，或者說，是什麼制度遏殺了中國的創新。新能源的未來，一定是需要創造一個開放的體制，容納各種新的能源可以生根、成長起來，那麼一定是如同改革開放初期的分散的、鼓勵試錯的一些政策。用鄧英淘的原話：分佈式能源動力體系，強調的不是串聯而是並聯，能源動力生產可以在局部地區經營，而不是通過傳統壟斷性能源公司集中生產，唯此才有新能源的生長環境。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建立這樣的思考基礎，才能為新能源的開發創新打造適宜的環境。鄧英淘的文集，幾乎囊括了各種新能源的介紹和各種政策搭配，新能源利用發展背後的制度問題，同時給出了那麼多具體的政策建議。對於新能源的開發利用，他除了講這些新的技術，還給我們算賬，如果政策到位，那將產生多麼美妙的成果，那樣的經濟發展就是環保的、永續的、和諧的。鄧英淘期許政府能有作為，「技術不是問題，關鍵是有作為」，他懇切地說，「如能成功，將更是功在當代、利在千秋之偉業」。

面對如此豪邁的情懷，我十分慚愧。說起來，我始終對於開發江河抱持著林一山先輩批判的「類人猿的生態學」的立場，是鄧英淘的這些調研報告，讓我心懷無限的感動。我們什麼也沒有做過，我們只知道輕佻地點評，鄧英淘卻身體力行，去思考西部發展、水資源、貧困下崗的鶴崗工人、在沙漠中戰天鬥地的牛玉琴們，最根本的是他有一顆火熱的心。

這詞如今不大聽人說起，我們這些已經從熱血沸騰的青少年步入老年的人，卻依然無法忘懷。記得40多年前，1966年冬天，景山學校的朋友邀請我到鄧英淘家去，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，一個目光炯炯的黑瘦男孩。他發明了用濕布浸開造反派貼的封條，可以毫無痕跡地進入被封的書

房。那是一個四合院，與其稱為書房，不如說是圖書室，從地到天，四面都是書架，放滿了書籍、圖冊。他說：你可以拿些你想要的書。結果，我拿了一套《遠離莫斯科的地方》上下冊，和七八張蘇聯印刷的俄羅斯名畫的明信片。多麼愚鈍的我，竟然只挑選了這麼一本書。此後的顛沛流離，卻一直揹著這幾張印刷得很差、卻美得要命的列賓、希施金和謝洛夫等人的明信片。

時光流逝，到了1997年，當我再次見到鄧英淘，各自都人到中年，他研究電信，研究再造中國、南水北調，研究新能源，依然是當年那樣目光炯炯，對各種新事物充滿好奇心，並慷慨激昂地討論、腳踏實地地研究和探索。總能在我失望、絕望的時候，輕鬆地用幾句箴言化解我的情緒。他語帶嘲諷地說我還是儒家，要學做道家。雖然他是達觀的人，但他的批評我看是矛盾的，他哪裡是道家呢？就憑他用這麼多年上下求索中國之大問題，沒幾個能相比的。這時候我總會想到「火熱的心」和「熱情是最好的老師」這老詞。當你有一顆火熱的心，你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表現，千種萬種的努力，無窮無盡的堅守，來完成自己的追求。鄧英淘的調研之路，與許多當地種樹養草、搞發明創造的人相逢相遇，他們都是用一己之力，撐起了中國地圖上可以發現的綠洲，也許開始那只是一個小小的綠點，但不停追求，會讓沙漠變成綠洲。

彭小蒙

2010年6月16日